

《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丛书

中国市场发育研究

卢中原 著



《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丛书

中国市场发育研究

卢中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1号

装帧设计：薛 蔚

责任编辑：王放鸣

责任校对：张振华

《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丛书

中国市场发育研究

卢中原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2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插页1 字数22.4万

1991年12月第 1 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80

ISBN 7-213-00719-X

F·132 定价：4.4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振兴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11亿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伟大的社会实践，呼唤着经济科学的繁荣，也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理论需要取材于实践。不断涌现的扑朔迷离的新的经济现象，势必引起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新的思考，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推向社会，以升华我们民族的经济理论思维，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现实经济研究》丛书。

这是一套研究、分析中国现实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的学术性丛书。学术研究崇尚科学，而与资本主义、崇洋媚外和因循守旧无缘。对中国现实经济的分析，自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思考，在深化对国情认识的基础上，力求作出反映经济现象之间内在联系规律的理论概括。我们愿与作者以此共勉。

当然，这一丛书中的各种理论概括，都不是

定论，或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而都是探索，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在一定折光下的映象和思路。但愿这些凝聚着作者辛勤研究心血的著作，因之而具有在较长时期中存在的价值。

受一些主客观条件所限制，这一丛书只是涉及中国现实经济现象中的一些侧面，并且，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们真诚地期待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市场发育的现实基础和研究视野	1
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多重尖锐矛盾及其对市场发育 的深刻影响.....	1
第二节 拓宽中国市场发育的研究视野.....	13
第二章 市场机制充分生效的理想条件	23
第一节 市场主体的完全自主运行.....	24
第二节 市场竞争价格体系的形成.....	30
第三节 各类市场的全面开放.....	46
第四节 市场竞争秩序的确立.....	67
第五节 市场供求总态势的基本平衡.....	72
第三章 非均衡体系中市场机制的实际运转	81
第一节 非均衡体系中市场的信号系统和调节方式.....	81
第二节 非均衡体系中的市场效率问题.....	97
第三节 预期因素与市场非均衡状态的相互影响.....	105
第四节 市场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转化.....	124
第四章 中国各类市场的非常规发育	134
第一节 结构性短缺和商品市场.....	135
第二节 供给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	151
第三节 金融市场的培育.....	162
第五章 市场有序运行和宏观调控	174
第一节 市场缺陷和宏观调控职能的确立.....	174
第二节 各类市场的相互适应及其宏观调节.....	181

第三节	宏观调节手段的成本与收益：政策工具的 重要选择依据	189
第四节	市场运行中的计划调节	208
第五节	市场运行特点、发育程度和宏观调控职能	219
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的长期协调发展	235
第一节	城乡市场体系的协调发展	236
第二节	公有制的完善和市场发育	257
第三节	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市场发育	270
后 记		286

第一章 中国市场发育的现实基础 和研究视野

中国的市场发育进程已经艰难曲折地走过了十年，今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市场机制的改革任务将越来越显示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市场在中国的发育进程，不仅困扰于制度条件的相当不完备，而且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严重紧张状态。进一步创造符合市场发育要求的制度条件，势必更深刻地触动旧体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一旦充分发挥，尽管有助于提高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又会尖锐地触犯某些传统的伦理信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有着过多的人口和过少的自然资源，有着过高的经济增长冲动和过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着过旺的需求压力和过差的供给能力。解决这些矛盾，无疑要求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然而，种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经济的复杂的非均衡局面，对市场发育产生着深刻影响。探明这些影响，并由此拓展市场机制的研究视野，深化市场机制的分析层次，或许会使我们在培育市场的努力方面少走一些弯路。

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多重尖锐矛盾 及其对市场发育的深刻影响

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状况堪称独特而复杂。如果一种非均衡经济是指市场供求关系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则是多种供求不平衡的交织和叠

加。自从展开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已开始形成，要素流动性有所增强，价格机制也在配置稀缺资源方面发生局部的或初步的自动调节作用，某些商品的买方市场已陆续出现。尽管总体上的商品短缺和劳动力供给过剩仍未根本改观，但与传统体制一统天下时的非均衡状态相比至少已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是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双重体制使经济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化的选择空间扩大了，调节机制复杂了，运行规则也混乱了。另一方面是经济非均衡状态的表现发生了某些明显变化，例如隐蔽的通货膨胀变成公开的通货膨胀，在职失业日益变成显性失业，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仍可概括为商品短缺、劳动力过剩以及社会总需求过旺三者的并存，而其集中表现是社会总供求差额的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初步测算，1982年至1987年，总需求共增长1.4倍，而总供给仅增长1.1倍，供求差率由不到3%提高到近13%。^①

我国社会总供求持续失衡并进一步加剧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历史遗留的、现实中新产生的、体制性的以及非体制性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其中一些尖锐的非体制性矛盾，将对我们选择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迫使我们在效率目标和社会公正目标的兼顾方面作出审慎的权衡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不断健全，市场机制的充分发育，无疑将缓解甚至消除原有的非均衡，使我国经济向新的均衡状态演进。但现存的非均衡状况及其背后的严重尖锐矛盾，又使市场健康发育和充分生效面临着严峻的环境约束、体制障碍和目标限制。要弄清中国的市场体系怎样才能健康发育，市场机制怎样才能正常运转，什么样的理论才适合指导中国市场发育的实践，不能不从分析现实中的多重尖锐矛盾开始。

^①参阅《中国统计信息报》1989年1月9日。

一、庞大的人口和稀缺的资源形成尖锐矛盾，就业压力、社会负担日趋严重，资源承载能力接近极限。经济效率目标和社会公正目标的协调程度成为市场发育的规范性约束

资源的稀缺性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然而在中国的庞大人口面前，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更显得极度稀缺。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是数量大、质量差，未来趋势是人口增长三大高峰相继来临和彼此叠加，由此导致就业压力和社会负担长期不得缓解。

我国总人口占据世界人口的1/5以上，而光是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世界文盲和半文盲总数的1/4强。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仅为4.8年，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日本的这一数字1975年时即达11.7年），而且远低于国内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程度（分别为8.1年、8.0年和8.3年）。①低质量的人口文化结构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也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重大障碍。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我国还将面临人口增长的三大高峰：一是总人口增长高峰。据预测，2000年时将突破13亿（超过“十二大”报告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1亿人），2000—2030年我国人口仍处于上升阶段，至2030年可达15—17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2000年时，农村人口将达10亿，其中适龄劳动人口将超过农村劳动力总需要量3—3.5亿。三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1990—204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亿增长到3.2亿，相当于2025年时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我国进入老年化社

①参阅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报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0页。

会，其特点是基数大，速度快，负担重。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重由10%上升到20%的时间用了46—67年，且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0 000美元的经济基础；而我国的这一过程却仅用20年，同时经济实力则处于低收入水平，仅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1 700美元。^①显然，三大人口增长高峰的相继来临，使得空前的就业压力和长期的老年福利负担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特有难题。

（二）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超负荷地供养众多人口，资源承载能力已接近并将超过临界点。

中国的一些主要资源绝对量虽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占有量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自然资源而言，我国现有人均可耕地仅为2亩，林地1.7亩，草地4.1亩；水资源2 600立方米。就经济资源而言，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仅为350多公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多美元（1980年不变价格）。按1987年总人口10.8亿计，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条件下，我国人口数量既已大大超过合理的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也已大大超过社会经济负荷能力。据测算，若从充分就业角度看，我国目前的经济适度人口应为8亿人左右，亦即过剩人口约2—3亿；若从土地资源生产力看（年生物生产量约32亿吨干物质，包括4 400亿公斤粮食），目前我国合理的资源承载人口应为9.5亿，过剩1亿人以上；若按土地资源的潜在自然力（年生物生产量约72.6亿吨干物质）和温饱标准计算，理论上的最大承载人口能力约为15—16亿人，这意味着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到2030年中国人口也将达到资源承载极限。^②面对如此尖锐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①参阅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报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

^②同上书，第25、30页。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在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安定的双重目标之间权衡和选择。配置资源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市场协调方式，二是行政协调方式。单从满足微观效率目标的要求来说，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论一国多么贫穷，资源多么稀缺，市场机制（假定不存在垄断）总是能将有限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并用它们创造出最大收益的地方去，也就是使现有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最低限度的消耗。当然，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随之拉大，一部分人将获得高额收入，另一部分人则可能获得很低的收入，甚至因失业、年老或生病而陷于贫困，而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考虑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目标，我们可能对市场配置资源造成的上述结果不满意，而倾向于选择行政分配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平均地，或是按比例、按优先顺序分配到各个领域，分配到各个社会成员，使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也可以缓解人口和资源的矛盾，维持一种普遍贫穷的社会安定，一种低效率基础上的公正。

效率目标和社会公正目标各自实现的程度是此消彼长的。权衡两者，对于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方式设置了价值判断准则。离开了两类目标的权衡，很难简单地说明哪种资源配置方式、哪种经济体制绝对地可取或不可取。如果需要找到某种正确的目标组合，并由此作为选择经济体制的依据，那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正确的组合。^①因为，在中国特有的人口和资源矛盾面前，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效率，培育市场机制生效的条件。而在

^①参阅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应当说明，这里的“公平”是指收入均等化，属于社会公正、社会安定范畴，不是指机会均等、平等竞争意义上的“公平”。

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才可维护必要的收入均等化。换言之，即使我们要追求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求助于市场机制，也不能忽视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反过来，必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又应当建立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事实上，当我们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用非市场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正目标，也正是在为市场机制充分生效创造极其重要的条件。

二、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极低的经济效率形成鲜明对照，有效供给不足而无效供给过多，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长期并存，消费者主权难以实现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而经济效率之低是异常鲜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源消耗两项主要效率指标印证了这一结论。如表1—1所示。

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数

表1—1

年 份	国民收入 增 长 (%)	劳动力 增 长 (%)	资产总量 增 长 (%)	综合要素 生 产 率 增 长(%)	综合要素生产率 占产值增长的比率 (%)
1951—1981	6.0	2.6	9.9	0.5	8
1952—1975	6.0	2.7	10.1	0.3	5
1975—1981	5.9	2.1	9.0	1.0	17
1981—1987	9.5	3.4	9.96	3.5	36.8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主报告附件五《从国际角度来看的中国经济体制》第37、59页表整理，1981—1987年数字系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计算方法和口径与世界银行的相同。

由表1-1可见，我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一直很低，1981—

198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5%，进步比较明显。但是考虑到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极快，为9.5%，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率为36.8%，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仍然不小。从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两项指标来看，巴西在1950—1960年分别为3.7%和54%，南朝鲜在1955—1970年分别为5.0%和57%，西班牙在1959—1965年分别为5.0%和44%，日本在1953—1971年分别高达5.9%和58%。^①

从资源消耗指标来看，我国经济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如表1-2所示。

每1美元产值所耗能源和钢材的国际比较 表1-2

国 别	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 公斤)	钢材消耗(公斤)
法国	0.39	0.133
日本	0.37	0.213
巴西	0.33	0.203
前联邦德国	0.51	0.116
美国	0.80	0.197
印度	0.80	0.435
中国	2.13	0.451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0月3日。

我国生产1美元的产值，要消耗数倍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能源和钢材，这样，增长速度越快，越会加剧短线资源的紧缺，越会忽视经济效率，进而导致短缺和积压的并存，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多的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目前我国钢材一方面极度

^①参阅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主报告附件五，第26页。

紧缺，另一方面却有高达2 700万吨的库存量，接近1987年全国产量的80%，仅物资系统库存就达250万吨，各钢厂超产的钢材约有70%用于物物交换。据专家估计，若减少库存钢材2 000万吨，一年可节约外汇支付40亿美元，减少企业流动资金160亿元，每月节约利息1亿多元。^①巨额的无效供给使经济增长的辉煌业绩黯然失色，供给总量短缺和供给结构失衡迫使消费者（包括生产资料的消费厂家）失去选择主权，强化卖方垄断，甚至加剧物物交换对货币交换的驱逐。

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的重要根源在于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我国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极快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极慢，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追加投入生产要素，而几乎不靠或很少依靠要素流动来调整资本存量，致使供给结构很难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在生产要素流动性很差的条件下，行政上级不是用关、停、并、转手段来迫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就是用票证供应等限额手段迫使需求结构适应供给结构。市场供求的行政性强制平衡缺乏稳定性，要素不能流动又必然再次求助于行政手段去恢复被打破的平衡，在这一过程的反复上演中，短线更短，长线更长，顾此失彼之类的结局往往难以摆脱。

速度与效益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协调这对矛盾涉及发展战略的选择。倘若我们选择靠质量、靠效益求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处境就会好转起来，消费者主权的确立，要素流动性的提高，供给结构的改善等等，也可以随着市场机制的推动而逐步实现。相反，如果我们继续使速度数量型增长战略“名亡实存”，已经成长起来、但还很脆弱的市场机制便有可能被窒息。

^①参阅《中国统计信息报》1988年12月26日。

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约束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相当典型的：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的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并存；少量的高级专业人才同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并存，如此等等。改革十年以来，传统农业部门内部虽然兴起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业产业，但是传统农业并未得到根本改造，广大农村主要还是靠手工工具劳动，技术装备差，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劳动力过剩严重，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生产、消费模式仍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我国依然呈现着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并存的显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培育市场，可能碰到三个重大难题。一是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有限，失业增加、城市拥塞等一系列麻烦将困扰城市管理者和居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就地消化是不可能的，他们向城市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由于我国城镇待业人口高达276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即使他们能够流向城市，也很难进入现代经济部门，因此失业将日益公开化，城市拥塞也将日益恶化。二是刺激消费需求过快增长，加剧商品供求矛盾。在市场机制决定收入分配的情况下，高收入和高消费阶层对低收入阶层的“示范效应”会引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攀比”，进而推动市场需求上涨。由于商品供给对需求的适应能力差，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就会长期持续。三是地区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市场自调节机制一旦运转起来，商品和生产要素必然流向能产生高收益的地区或部门，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

区的资源将被发达地区吸引而外流，落后地区发展乏力，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落后地区为了维护地方利益（许多理由不能说不合理），往往会采取地区封锁的办法阻止资源外流，结果全国统一市场便遭割裂。

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内部的诸种不平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可能发生分化和重组，也可能在原有差距基础上扩大和恶化。只要有利于资源流向高效率部门和地区，并且不必付出过大的社会成本，那么可以认为市场机制的运转是合意的。但是，当市场机制使某种差距过大而社会成本过高时，我们就要运用非市场的手段弥补或纠正市场运行的不理想后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要齐头并进的平衡发展？还是要不平衡中的协调发展？前者效率低些，但公平些；后者效率高些，但公平程度较低。如果选择前者，那就少让市场发挥作用；如果选择后者，那就势必更多地求助于市场。当然，即使选择后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依然要注意地区差距对全国统一市场的约束，这将有助于我们寻找适当的市场发展战略，以便使种种不平衡尽量保持在协调的或至少是可容忍的限度内。

四、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目标冲突、体制摩擦和利益矛盾，深刻制约着市场发育的步伐和前景

以培育市场机制为重要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长期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过程，它必将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目标冲突和新旧体制摩擦，触动既得利益，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还将猛烈冲击传统的价值判断准则，推动社会心理发生变迁，甚至是很痛苦的变迁。这些因素的矛盾运动既可能促进市场发育的步伐，又可能阻滞市场发育的步伐；既可以使市场发育的前景比较光明，也可以使其变得暗淡。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在更